

方东美论道家政治理想〔*〕

○ 施保国

(广东省嘉应学院 社会科学部, 广东 梅州 514015)

〔摘要〕方东美认为,对于道家政治主张之所以产生“无治主义”、反政治或“君人南面之术”的误解,主要源于汉代及后人的曲解。在中国传统德治、礼治与法治传统中,道家政治理想属于德治,其积极的政治理想和德治主张说明了无治主义或权谋之治观点的荒唐。方东美指出,道家“冥齐物我”的世界观要求立足于“此世”,通过道家契入大道,臻于至德内充的境界,冥齐物我,这是道家的政治哲学基础;道家的德治理想决定了应效法道家“道”的生畜创造、“天”的化育完成和“自然”的创造进化,这是道家的政治精神;道家政治观的包容性表现在道本参透道体,生生不息,体现道家政治妙用;方东美的道家政治实践,决定了其对政治具有独到的理解。

〔关键词〕方东美;道家;政治理想

钱穆指出,中国思想,常见为浑沦一体。极少割裂斩截,专向某一方面钻研。故所长在整体之融通,所短在部门之分析。^{〔1〕}方东美认为,论道家政治理想,也只有从道家思想的整体体系中探究。“中国的道家哲学亦以道为无所不在,而不以之为超绝,要人于蝼蚁稊稗中见生天地之原理。”^{〔2〕}道家把道的标准从人生立场解放,而普遍归之于宇宙一切物,如是则人生界不能脱离宇宙一切物而单独建一标准,应以平等视之宇宙一切物之各项标准。政治是人生界中之一业、一现象,绝不是西方所说的超绝,所以,应该从一切物与大标准着眼,才可以了解道家政治理想的精髓。方东美通过对道家政治理想的哲学基础、精神品质、包容性阐

作者简介:施保国,哲学博士,广东省嘉应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思政教育。

〔*〕本文系2014年度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项目“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WT143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GD13XMK06)的研究成果。

释和积极实践可澄清学术界的一些误解,如视道家为“无治主义”、“君人南面之术”、反政治等,为现代政治建设提供启示。

一、“冥齐物我”:论道家积极的政治哲学观

陈鼓应认为,道家整个哲学系统的发展,可以说是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治论。然而,如果人们了解老子思想形成的真正动机,就可以知道他的形上学只是为了应和人生与政治的要求而建立的。^[3]方东美从没有博取政治高官的念头,“一生都坚定主张以哲学文化理想原则来领导现实政治”。^[4]具有“道家资性气质”的方东美指出,在人类全部业力中,政治生活,并非是隔离的绝缘体,它的真谛需贯彻许多事象才能显出,如对世界、人性的看法,都影响政治理想。道家“冥齐物我”的整体世界观要求人不能超然于政治之外。方东美认为,道家的政治哲学观体现在注重“此世”以及“完成大我”等方面:

首先,中国人的生活兴趣寄托在“此世”,认为在现实的人间世中,可充分完成人类所追求的包括政治理想在内的一切价值。人们通力合作的创造性生命可点石成金,将现世点化超升、臻于理想,而不像宗教狂那样只以逃避的出世态度,求渺茫的他世。老子说过不少话表明他的“此世”观,如:“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道德经》第二十七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道德经》第八十一章)方东美认为,这些言辞都表现出道家对社会、对世间人和物的关怀,从中可领会老子的忧世之言与救世之心以及政治情怀。庄子借老聃之口说:“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不似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勿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乎无有者也。”(《庄子·应帝王》)“衣食万物而不为主”(《道德经》第三十四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第五十一章)此玄德却是理想的政治主张，一切皆各原于天，但不自居功，故万物即曰我自然。庄子不承认有“首出庶物之天，因亦不承认有一首出群伦之皇帝”，“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庄子·应帝王》)本不需要一政府、君人之教导与管制，即庄子所说的无政府主义。其实，庄子并非主张无君论和不要政府政治。他所谓的君是一个理想的君，必能“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庄子·应帝王》)只是理想君主，不容私利而已。这样的话，有君即等于无君，有政府亦等于无政府。庄子以为，天是一虚无体，则帝王亦是虚无体，方可发生理想政治的作用。

其次,生命目的在于精神自由的“积健为雄”,不与小我混为一谈。^[5]人们尽量发展普遍的同情心来拯救世界,然后充分领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人生的意义在于通过集体的奋斗,朝着美与善的方向努力,能够体现道家的政治哲学理念。方东美认为那种视道家为弃绝仁义的说法根本是无稽之谈。他指出,道家一直是“尊道崇德”的,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

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畜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第五十一章）在方东美看来，“道”与“天”同是生命的“本原”，“生”与“畜”则是妙道的“运行”；“长”“育”“亨”“毒”“养”“覆”是生命之“相”，而“莫之命而常自然”，则指生命的“感应”，表示生命本身有莫大的潜力，创造自如，毫无节制。从方东美对道家精神的集中描绘，可看出“积健为雄”的积极心志。“大用外腴，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方东美说：“我管这叫做道家之大合唱。”^[6]中国诗人，老庄以后，如屈原、曹植、阮籍、李白等，其优美的灵魂乃遗世独立，飘然高美至于宇宙晶天之“寥天一”处，内合于道，致力于精神自由之灵台，使得种种“小我”的悲欢离合、辛酸苦楚等束缚之人生得以解脱。

再次，道家“冥齐物我”的精神境界要求遵守大公无私的社会政治原则，致力于健全快乐的生活。方东美高度赞扬道、儒、墨三家政治思想，认为人们的政治生活受到三种高尚的精神感召所致：一为通过儒家以同情忠恕追求至善政治理想，即能够在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之后，奋然兴起，参赞化育，以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活力，追求所有生命的充分完成；二为通过墨家能力行兼爱政治理想，避免互害，遵照“尚同天志”的原理，原天以律人，使人之所以能契合天之所欲，据此以全天志好生之德，并使一切万有都能在广大同情之下视为平等价值，这就是墨家的根本法仪；三为通过道家能契入大道，臻于至德内充的政治境界，“消极的能够据以不役于物，消弥一切私心，积极的则能据以冥齐物我，怡然与大道同体，这就是道家的卓绝气魄。”^[7]这也是方东美最为欣赏的契入大道的方式。

然而，政治思想分为理想政治和现实政治两种。现实政治指的是为图私利而玩弄民众的种种敲诈，此为方东美所深恶痛绝。方东美所称颂的理想政治是以光明正大的措施，不仅使每个人都能享有公平的创造机会，充分发展天赋的才能，而且广大的人群都可发挥兼爱互助的精神，遵守大公无私的社会正义。广大的人群，在顺境或逆境，都可发挥兼爱互助的精神，以道家“冥齐物我”的精神境界，遵守大公无私的政治原则，共同致力于健全快乐的生活。在此原则指导下，各国之间可通达心志，平等互动，联合起来，为增进人类全体生活的和平安乐而努力。只有这样，理想政治才能实现。方东美赞同柏拉图的政治观点，即国王君主是哲学家或者深具哲学精神，使伟大的政策与伟大的智慧合而为一，让那些各有偏执的庸才都退到旁边，国家才有可能生存，才有希望。^[8]

此外，方东美特别提到要避免对道家政治的两种误解：一为视道家为“无治主义”或反政治。如梁启超说：“道家信自然力万能而且至善，以为一涉人工，便损自然之朴，故其政治理论建设于绝对的自由理想之上，极力排斥干涉，结果谓政府不必要，吾名之曰无政府主义。”^[9]方东美认为胡适曾指出道家的反政治意识，他认为胡适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掌握材料不够、理解有误，“在胡适的哲学史里面，重要如道家，他却把老子看成反政治意识；孟子的重心明明在教

育学说,他却根本没碰上边。另外也有人看佛学复杂难以整理,就到日本去乱抄。中国哲学通史很少人能写,为什么原因呢?第一,材料不充分;第二,无法驾驭材料”。^[10]二为张采田在《史微·原道篇》中提出的“道家者君人南面之术”。^[11]在这里,方东美强调了道家的理想政治精神,认为“无治主义”、反政治或“南面之术”都是荒唐的。他指出,道家的政治思想从两方面来看就很好理解了:一方面,对抗“现实政治”玩弄阴谋的一种“无治主义”、反政治意识、权谋之术,并非真正的道家政治主张;另一方面,道家真正的政治主张是怀抱远大的政治理想,以宽容慈惠的精神与大公无私的美德,教人要效仿大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精神,要“政善治”,即放下私心成见,浑浑然以百姓心为心,以百姓苦为苦,才能上下一心,同登幸福之域,此为道家积极的政治理想。

我们认为,方东美强调道家冥齐物我、顺应自然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然而如此主体感官上的纯任自然的结果,事物的发展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很值得怀疑的。道家思想都肯定了人和自然万物的一体情状,然而人和自然事物在本质上是否同一?这显然是有问题的。事实上,人是有意志、有理性、有感情的。意志的表现、理性的作用、感情的流露,都使得人之所以为人,和自然事物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别。^[12]还有,方东美对于胡适的“反政治意识”批评也不够准确。尽管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三篇老子》中指出老子是极端的破坏主义,对于国家政治主张极端的放任,“对于那种时势,发生激烈的反响,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胡适),但胡适的“反政治”指的是老子针对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言的“反政治”,胡适主张的老子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也是积极的。如袁玉立先生所言:“老子的全部思想,是以自然无为思想对三代以来‘治人事天’的矫枉过正,即是对专制国家的过度管理、尊卑贵贱的永恒范式的反制与平衡,是对于过度的政治压迫思想束缚的反抗与革命。”^[13]

二、“藏天下于天下”:论道家的德治理想

我们如何为国家政治建设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呢?方东美主张,应该契合道家道德的精神、完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严格说起来都应是道德中事,理想的政治正应契合道德的精神,表现出圆融的和谐之美,而绝不是冲突的暴戾之气。”^[14]

首先,应知道国家存在根本理由的人文道德性,注重道德、教育、文化理想的作用。如要了解理想政治的真正倾向,方东美认为,除了政体、权略、政令之外,更须先追问国家存在的根本理由,即人文道德:(1)国家是一个要充分实现人文生活的场合,一切重大措施是要保障人民生活的共同安全与幸福。中国传统人文使天的宗教、神的宗教成为道的宗教、祖先的宗教。“中国原始信天之宗教,孔子以后即在上层学术文化中失势,而代之以祖先之宗教。”^[15]但中国圣贤虽教人尊祖祀先于鬼神之存在却并不加以肯定,只是说祭神如神在,重在教人于祭祀之际缅怀先人的言容笑貌,使子孙之精神与父母祖先之精神宛然再遇,使子孙不

忘所自生,返本复始,民德归厚,整个国家幸福安康。(2)国家不只是一种政治、经济、军事的形式组织,更重要的乃是要进一步以此为行道的园地。中国文化是一种高度道德化的文化,它以道德为核心。在敬神之中重事死如事生,如闻其声、如见其形,正是一种道德陶冶,表现为道德的神在生活中发挥作用。这种道德属于形上学,而不像黑格尔把道德贬到“绝对精神”之下的“客观精神”。(3)国家是一完满而优美的学校,能发挥人文化成的大用,使人民的潜在才能有充分的发展。(4)国家,是文化价值绵延创造的园地,除了立法措施外,更应让人民有平等的机会,使公民们在善尽义务之余,还能发展每个人的特殊才能,让人民有平等机会,增进文化价值的创造活动。

其次,“藏天下于天下”的德治主张可使国家长治久安。方东美反对各种赤裸裸的暴力政治和那些短视势利的现实政治,认为这样的政治不可能使国家长治久安。他以道家庄子的寓言表达“理想政治”的标准,即“由道德力量来推进,由教育大计来普及,更由文化价值来固守。”^[16]“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方东美认为“庄子这段妙语具有深奥的哲理,其用意当然不只在解释政事”,^[17]“藏天下于天下”强调了道德精神、教育力量、文化理想对安邦定国的重要价值,如果只知道以力服人,靠现实政治的经济、军事、政治,尽管费尽气力,整个国家在夜半还是被偷走了。在中国古代德治、礼治和法治传统中,方东美欣赏德治,接受礼治和适当的法治,以“力”或“术”统治容易腐败,不为所取。大致说,道家、儒家和墨家多主德治。后儒自荀子起盛倡德治兼礼治,法家则遵循法治,后法家人极术之中而失去了效用,最终与“藏天下于天下”的德治理想背道而驰。这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方东美引柏拉图“政治篇”来说明“藏天下于天下”的德治主体“哲王”。“治国如医病”,如最理想的政治主体“哲王”以完美道德智慧为准则,并能英明地力行实践,则不需要“法”了,但是在广大民众的国家里,现实政治情况比理想中复杂得多,病人众多,需一套系统法制,借法治以补德治礼治的不足。所以方东美主张,德治为最理想的政治信仰,礼治次之,法治也可,千万不要用“术治”与“力治”。从为民谋福来说,法治的重要性不容否认,法治是对德治的补充,但要“把合情合理的‘法’与权谋巧诈的‘术’分开,便知法治仍是一种理想政治,不像术治或力治一样不足为取”。^[18]当然,法治的一些原则必不可少,如“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备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不可为一人枉其法”。^[19]

方东美批评了儒家的德治主义。他说:“从儒家来看,国家就是这种道德精神实践的园地,政治就是这种道德精神开放的花朵。因此,政治的生活就是道德的生活方式”。^[20]因此,要将整个宇宙和政治看成同一类型,即体验宇宙要达其美,体验生命要正其性。但是从这一层看,儒家的“德治主义”又很容易变成“礼治主义”,孔子说:“尊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21]儒家伦理绝对主义

窒息了其学说中的主体性原则,不利于独立人格的成长和个性的发展。《论语》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成了尼采所说的“羊群式道德”“奴隶道德”,导致人们的生活缺少活力与创造力,即缺“酒神精神”。这种泛道德主义,使人的视、听、言、行都受到局限,教人循规蹈矩。《诗经》中孔子的伦理教化解释,使泛道德意识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消解了创造热情,压抑着创造冲动。而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是民主、自由、法制与生产力的发展,在这方面,儒家意识形态是一种阻力即非动力。

再次,大的政治家应效法道家“道”的生畜创造、“天”的化育完成和“自然”的创造进化。一切万类都修养生息于此精神之感召中,做到“尽人其才,尽物之用”,这样才是为而不恃,和而不争的政治精神;再一方面,老子反对专制君主的剥削,所谓“损不足以奉有余”,他要竭力提倡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种看似无为实际“无不为”的政治即是方东美所说的积极的政治——“德治”,并做到“善行者无辙迹”,绝非“无政府主义”或“君人南面之术”。道家的德治视宇宙的存在与发展过程中蕴含了丰富的价值,而否认宇宙为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机械系统,它否定了价值中立的思想观点。他对西哲二分法、二元对立进行深入剖析与批评,认为其偏执于逻辑分析方法与“孤立的系统”的理论局限,以及忽视价值,导致价值贫乏的价值中立主义。

三、“阴柔慈惠”:论道家政治观的包容性

不同于儒家为“时际人”,将人分为庶民大众、知书达理的人,文质彬彬的君子、大人,内圣外王的圣人,至天人合一的至上境界,道家为“太空人”典型,具有提神太虚、俯视万物的自由解放精神,及由道家特有的诗艺灵感所激发的空灵意境。发挥艺术才情,以开阔包容的心胸和超现实方式,观照现实、拯救现实,这是方东美一直所强调的道家精神。

首先,方东美以司马谈论道家之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说明了道家的虚怀若谷的阴柔慈惠和包容的特征。他认为,老子参透道体,好似生生之源,周行宇宙,溥博和同,虚而不竭,无一物失道之本体,无一处缺道之妙用。老子怕人类自私,见小失大,不能法道之无不生成,教人去私以息争,退身以存公,反复说“吾之大患,为吾有身”“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第二十四章)。以此虚无之心,杜绝世间的政治纷争,当然,面对战争,也要“道法自然”,激发斗志,首先取得精神之胜利,树立强大的自信心,在知晓双方情况的基础上,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我希望全国各个青年,在物质战争、物力战争、兵器战争上……先作精神战争中一位所向无敌的文化战士”。^[22]

其次,道家深知生命是大方无隅、相符而有、一往平等的,所以执着于大象、守道于大中,包容万物的是非。这犹如百川全入大海,并行而不悖,正因为能宽宏大量,容纳众流,所以才能蔚成主流,形成万盛的生命气象。所谓“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大德之人立身清纯，恰似大海之不竭，此即所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所以才能够善体大道，使道不失德。常善救人，使人无弃人，常善救物，使物无弃物，这是何等伟大的精神！^[23]此道家伟大的道德精神就是“慈与惠”，就是“爱、仁、亲”。方东美指出了道家人格发展的特点如下：一是道家天人合一的态度，肯定了人性可使之完美，每个人的人格可通过精神修养而达到极高的境界；二是超越的态度，从现实出发去超化现实，点化为理想世界，即道家的艺术世界；三是包容的态度。他说：“中国人向来具有一种天才，凡是遇着有形迹、有障碍的东西，并不沾滞，总是把他们点化成极空灵、极冲虚的现象”。我们知道如何在物理世界掩其实体、显其虚灵，显其极大的包容性，世界真相因此而展现，“真”的领域因此而显豁，“善”的领域因此而完成，“美”的领域因此而实现。老子说过：“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道德经》第十一章）世上许多东西的功用都不在于物体之实，而在空虚、包容之虚。“就以一座演讲厅来说，在屋顶下各位能发现什么吗？除了一大片空间，充满空气之外，什么也没有，然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中国智慧里‘去其障，致其虚’的精神作用”，^[24]所谓“含情无言最迷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应该说，中国传统哲学内容非常丰富，道、儒、墨、法、阴阳家等都有值得肯定和吸取的积极因素。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利弊，有选择地接受并创造新的文化成果，是方东美哲学的重要方面。道家的自然无为及其不干涉主义，对于专制政体具有很大的消解作用，它的叛逆精神及其“一切价值重估”的观念，对于僵固思想具有极大的激荡力。对己来说，不固执己见；对他人来说，“安时而守顺”，如庄子言“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庄子·人间世》）此种“叛逆精神”体现在他人方面就化解了“叛逆精神”。李存山先生也指出道家的治世思想：“道家思想不治世则已，若治世则其强调‘君臣之义’往往不逊色于儒家，从老学衍出的法家实践了老子‘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理论，……汉初黄老之学尊王胜过儒家。”^[25]

四、方东美的道家政治实践

方东美一生从事哲学活动达五十三年之久，其政治实践体现了他的“道家资性气质”。一为“创造少年中国会”，凸显道家冥齐物我哲学视域下学术与政治不可分的主张。方东美于1919年成为“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的会员，并任《少年中国》月刊总编辑。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前后，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方东美是南京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为发动学生运动而奔走忙碌。在1920年“少年中国会”第一届会议上就“政治活动问题”，方东美说：“我不赞成对现实政治全无反抗，故主张加入政界。但就事实说，旧政界内幕复杂。政治活动，局外人说什么监视，实则只是空谈。故我亦信旧政治除打破无二法。”^[26]就“学会宗

旨及主义问题”时,方东美说,“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规定得很好。这已指出学术不能分开,而且果有益于社会,为学亦活动之一种。”学术要有益于社会政治建设,这是学会活动的宗旨。^[27]

二为反抗现实黑暗政治、向往理想政治,以“积健为雄”的姿态实践政治理想。1925年,方东美与罗家伦、梁实秋等共同执教于东南大学,他不满意当时的政治现实,因此不赞同罗家伦的所谓政治抱负。“假使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若想根据他的理想来搞政治,柏拉图就是一个前车之鉴”,“不管任何人,要有柏拉图的能耐,怀抱理想而从事实际的政治,有两个条件:第一,肯拿头出来,第二,当主张不能实现时必须降身为奴。但是柏拉图却把他政治上的理想,写成不朽著作。”^[28]作为学者如何为国家政治理想作出贡献呢?在抗战前夕,方东美积极投身政治,应邀于中央电台做八次《中国人生观》的广播演讲,呼吁以中国哲学精神振作力量,抵制外敌。“七七”卢沟桥事件后,在庐山会议上,方东美就如何抗击日寇侵略,慷慨疾呼,“力言民族精神和文化命脉之重要,半小时的讲话中慷慨激昂,声泪俱下。”^[29]吴经熊认为方东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爱国学人”,评到:“他对民族与文化的灼灼热情、理智与感情并行相映的哲学智慧,以及他那一生秉持的浩然正气与赤子之心,都是永远值得有心人士缅怀与纪念的。”^[30]正如殷海光先生对陈鼓应感叹的那样,“台湾当下有风范、有骨骼的知识分子太少了!像方东美那样,便是仅剩下的一片傲霜叶了。”^[31]

三为包容开阔心胸。方先生以包容开阔的心胸看待对民族和国家热爱的不同方式。在抗战胜利还都的南京中央大学礼堂里让在场的师生大大见识了一次。那时许多人都有“以胜利者回到沦陷区”的心理,譬如当时的南京有伪中央大学,上海也有伪中央大学,那些学校里的学生是有泪流不出。国民政府一批腐败不能的官员竟然张口闭口称伪人民、伪学生……方先生听了极其愤慨,怒斥到:“当撤退时,你无飞机、无轮船可坐、无火车可乘,所以才留下来,在沦陷区便深受日本人的蹂躏。我们在后方每逢遇到日本飞机袭来,我们并不悬念我们的安全。因为我们在后方,不管贵州也好,云南也好,都有安全的地洞可躲轰炸。表面看来好像很危险,其实我们却很安全。但是我们在防空洞里面所悬念的就是南京大屠杀以后,连带了在各沦陷区里面留下来的同胞在遭受日本人的蹂躏。所以我们怎么能忍心叫他们‘伪民’!他们在沦陷区里面为民族苦撑而忍受这一种灾难。天下只有伪政府、伪币制,哪有伪人民、伪学生的!”^[32]顿时整个中央大学的礼堂哭成了一团。对于处于沦陷区里爱国的广大百姓和学生以同情、理解和支持。

四为弘扬道德生命。方东美亦诗人亦哲学家,他认为庄子亦诗人亦哲学家,并认为庄子一生献身于道德生命的高扬。庄子悲悯于人们为一己私利、表象的价值、世俗的虚荣,而把真理泯灭在物质的世界里。方东美赞同庄子的整个精神在于完成一种寓言化的大思想体系,以辨明精神解脱的重要性,彻悟道德生命的崇高意义,使精神升华与道体合一,把人世的快乐与天道的至乐打成一片。这也

是方东美政治理想的追求和生命写照。方东美一生以苦为乐,多次以“坐飞机”的方式发现生活中的道德和美,融会贯通古今中西哲学,致力于中国哲学的广布和弘扬。他在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等多种场合为捍卫中国哲学尊严、推动哲学伟大复兴和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作出积极贡献。

五、小 结

方东美为中国现代哲学家,因其“亦儒亦道亦佛亦西”的学术定位,使学术界很难将其明确归入哪一派。正因其注重平等的“学统”而不是“道统”主张,使他对道家的政治理想非常青睐。从方东美对道家政治观的分析,我们觉得,今天的政治建设可从中获得有益启示:如何做到“冥齐物我”、如道家般积极的政治观呢?道家德治观的包容性及“藏天下于天下”的德治理想所体现的气度尤其为今天一些囿于具体道德范畴的行为所借鉴。方东美的德治思想可作为眼下的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德治精神渗透的有益补充。

注释:

- [1]钱穆:《庄老通辨》,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05页。
- [2][6][15][24][31]方东美:《生生之美》,李溪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81、2、123、344页。
- [3][12]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41页。
- [4][29]杨士毅:《方东美先生纪念集》,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第59、53页。
- [5][7][8][9][11][16][18][19][20][21][22]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2005年,第310、311、312、315、316、314-315、325、325-326、319、322、121页。
- [10]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2005年,第40页。
- [13]袁玉立:《尚中、中道、中庸:自古就有的普遍观念》,《学术界》2014年第12期,第159页。
- [14][17]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25、221页。
- [23]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99页。
- [25]李存山:《道家主干说献疑》,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47页。
- [26]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第3页。
- [27][32]王月清、李钟梅编:《东方诗哲方东美论著辑要》,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23页。
- [28]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第308页。
- [30]吴经熊:《浩然气,赤子心——怀念东美先生》,《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2005年,第50页。

[责任编辑:钟 和]